

〔中〕刘岸伟 著

盛莉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上，
小泉八云扮演了无可比拟的角色。

他的作品被中国文化界广泛接受大概是在20年代。
本书旨在概观小泉八云在中国文化界以及文坛的地位，考证小泉八云
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以及对近代中国文坛的影响。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刘岸伟 著

盛莉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中)刘岸伟著;盛莉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1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307-05907-8

I. 小… II. ①刘… ②盛… III. 小泉八云(1850~
1904)—影响—近代文学—研究—中国 IV. I313.064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014 号

KOIZUMI YAKUMO TO KINDAI CHUGOKU by Anwei Liu

Copyright ©2004 Anwei Liu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b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Inc., Tokyo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此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岩波书店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7—2006—037 号

责任编辑:易 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7.125 字数:163千字

版次: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907-8/I·328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20 世纪初叶,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F · Graebner 1877 ~ 1934 年)与奥地利人施密特(W · Schmidt 1868 ~ 1954 年)提出“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或曰“文化核心区”、“文化源地”),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或曰“文化边缘区”、“文化受容地”),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当然,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希腊——罗马文化、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另外还有一种更具全球视野的划分:东地中海文化圈(以后扩展为北大西洋文化圈,俗称西方文化圈)、西亚北非闪族文化圈(今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亚文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划分与命名。上述“东亚文化圈”以地理属性得名,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从体质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故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儒学(故有“儒学文化圈”之称)、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等。

拥有若干文化共相的“东亚文化圈”,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国是东亚最先进、强大的国家,占据文化高势位,是文化输出国,中国的水稻、粟、麦栽培技术,冶金、养蚕、缫丝技术等传入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之相随,前述汉字文化的诸多门类也播扬周边列国。诚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诗称: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

越、朝、日等东亚文化圈周边诸国,皆有自己辉煌的文化创造,同时也都接受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昭显了东亚文化圈边缘带研习核心区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强调,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日本文化史研究》)

时至近代，东亚诸国都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西学东渐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新命题，东亚诸国在 19 世纪中末叶先后进入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过程。比较而言，日本较迅速地吸纳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先进国和新的文化源地，中日文化势位对比发生异动，文化传输的主流方向逆转：古代是中国——日本，近代是日本——中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留日热潮，便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努力。进入现当代，中、韩等国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渐成迎头赶上之势，在新的文明水平上，东亚诸国发生着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动，东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耀，对全球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当下世界最为强劲的两大大文化圈，当然，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概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化圈诸国互为师友，由于文化互动而彼此受益。在近代，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与东亚文化圈其他诸国严重对抗，造成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劫难。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反顾东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历程，我们有充分理由宣称：和则互利，斗则两伤。化干戈为玉帛是时人的使命，也正是本书系的基旨所在。

笔者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以东亚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事相关合作研究，结识东亚列国学者，并研习其论著，亲炙东亚文化丰富的内涵，渐以推介东亚文化为乐事。2004 年夏至 2005 年夏，笔者访学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邀约笔者选取一批反映东亚文化的日文书籍，译介给中国读者。受命后笔者即与“日文研”刘建辉博士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择得八种，延请译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者，经两年劳作，成此“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2007年10月24日拟于武昌珞珈山

——序

活跃在世界史舞台的作家——

提起小泉八云的名字，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感觉很陌生，但在 20 世纪初到抗日战争期间，小泉八云及他的作品对中国文坛以及当时赫赫有名的作家都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那么，在那个时代，小泉八云即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 年）的作品在中国究竟有怎样的反响？当时的中国读者是怎样读赫恩的作品的？本书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概述，并讨论其意义。

赫恩是以英语为母语，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同时他还有一个叫做“小泉八云”的日本名字，他的创作也有很大一部分取材于日本。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小泉八云作为《怪谈》、《古董》的作者而广受青睐，“浪漫的诗人”、“风格多变的文人”这种印象深植于读者心中。但另一方面，在欧美英语圈中，赫恩仅仅是 19 世纪浪漫主义流派中的一个小作家，在人们印象当中他也只是一个报道异国风情的记者而已。

然而，与人们的印象恰恰相反的是，小泉八云其实是一个颇有深度的作家。漂泊了大半生，辗转到了日本的赫恩在痛恨西方文明的冷酷、贪婪与伪善的同时，也预见到这种“文明的力量”也许将风靡世界。正因为如此，这个东方国家就像前世就与他结了缘的“乌托邦”。但是，不久，赫恩却看到了不得不投身于欧化的汹涌怒涛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的苦恼。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这位注视着世纪巨变期的尖锐的文明批判家埋头于万物有灵论的鬼魂世界。他的一部描绘日本的“原野风景”的作品，作为用英语写下的明治文学，作为洞察近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历史纪录，作为触及了民族体验的深处的个人与历史的对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他的文章在解读时已经深深地带上了近代日本的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印记，因而作家的声音在不知不觉中冲淡了，并逐渐随着席卷日本的国际实务论的消长，或者是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被不断地诠释开去。国内外的部分读者对于赫恩有所避忌，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赫恩在欧美名声的下滑，以及在战前和战后的日本人以民族主义论调评论赫恩等都是其典型例证。

在西洋与日本的夹缝中生存的赫恩的一生，对赫恩褒贬不一的评价，这部讲述他生前逝后的故事的“连续剧”会怎样呈现在第三者的眼中？20世纪30年代是赫恩的创作高峰期，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被广泛阅读，这也是为日本或者欧洲的读者所不知的。在“小泉八云”的名义下，赫恩的作品在近代中国究竟有怎样的反响？透过现代中国这个三棱镜，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作家世界？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近代日本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对比，并且不过度拘泥于文章本身，也许可以打开构筑新的作家论的一方新天地吧。

现如今，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小泉八云”这个名字已经只是一个早被遗忘的人名了。与和他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们，例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马克·吐温（1835～1910年）、莫泊桑（1850～1893年）等相比，赫恩的知名度就几乎为零了。

诚然，在作家的标准、作品的知名度或者说对近代中国的

影响等诸多方面比赫恩更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有很多^①。然而，在从清末开始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中，还有谁能像赫恩那样能有那么多彩的风格、用诸多文脉来表达思想、作品能被用不同的语言阅读？赫恩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读书界广受欢迎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小泉八云”的汉字名为人所知的这样一个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向我们展现了他多彩的变化。譬如作为一个拥有抒情诗人般同情心的东方解释者，作为无比热爱日本文化的亲日家，作为一个领会了热情而又巧妙的教学法的西洋文学的最好的介绍者，作为开创了国民性研究道路的先驱者，作为留下了富有异国情调的名作的随笔家，有时又是呼吁中日友好宣传国策文学的装潢招牌，等等。

乔纳桑描述了赫恩在成为小泉八云以前漂泊的半生，说起自己被赫恩吸引的理由，他提到：

我发现拉夫卡迪奥·赫恩不像对于他的陈腐的评论所说的那样，仅在日本就发挥了他随笔家的才能，写出了凝聚其思想的散文（《空想与其他的幻想》），他不仅是写出了这部作品的作家，也不光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作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民俗学者、英国文学学家和日本佛教的解释者，他都留下了光辉的业绩。^②

① 《中外文学比较史 1898~1949年》，上、下两卷，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是近年来由中国学者所著的值得关注的比较文学的成果之一。在卷末的索引中，收录了关于近代中国158名主要的外国作家的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赫恩的名字。在第十章“英国、法国的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中仅有一处提及小泉八云的“论小品文”。

② 《彷徨的灵魂》，真崎义博译，“文艺春秋”刊。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从他的多方面才能和广泛的创作来看，赫恩为何能用各种文脉来表达思想，这在近代中国有某种程度的说明。当然作家去世后出现的这些脚本，本人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的文坛以及读者与小泉八云的结识应该载入中国近代文化史中。

赫恩生于19世纪刚好过半的1850年。提起19世纪后半期，大事不断。在伦敦（1851年）、巴黎（1855年）相继召开万国博览会；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引起轰动；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19世纪首次出现了“人种”这一概念，人们从未有过地慢慢认识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传播也扩大到全球规模。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史的时代开幕期。

赫恩于1904年正值日俄战争时去世。接着大约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后由对大战的反省衍生了东西文明的对话，人们意识到要融合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也可以说是要迎来世界史的时代。赫恩虽然是一位出生在西方国家的作家，却能触及东方人的心弦，洞察其灵魂深处，他就是在这时作为一位“东方的解释者”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在被称为“西方的世纪”、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的时代，赫恩能做到对“本土”文化的深入观察不是一种偶然，这也许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深的关系：他在希腊出生，在都柏林度过少年时代，又扬名于美国，接着在法国领地西印度各岛采集民俗，最后终于走到远东的日本；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认同泛灵论的作家。他幼年时期经历的灵异事件自不用说，他在美国南部的波止场听到的黑人歌曲，以及在马提尼克收集的西班牙民谣都能听出无数灵魂的声音。来到日本以后，他又深深地被日本民俗所吸引，他躲在草和叶子的背后倾听。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素未谋面的盲女的歌声在身为外国人的

赫恩心中引起了共鸣，可以说，赫恩的思想和文学已经跨越了人种与文化的壁垒，是有志于“超越了一个民族的经验总量”的人类的普遍性的思想文学，赫恩本身也没有局限于一种固定的价值观，他致力于多方面、多角度的观察，是一位活跃在世界史时代的作家。他明确地认识到文化与人种间的差异，同时理解这种对象的异质性，又不沉迷于此。可以说想要吸收不同文化的赫恩的这种生存方式是无意识的，但是他预见到当今世界的状况：人们讨论文化的多元化与统一性，相对性与普遍性；异质文化的共生共存也作为课题被提出。

在考察 19 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改观时，中国社会对西洋文化的抵制以及吸收往往是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力量，不得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一部分先觉者看来，民族的素质甚至是思考方式都有必要进行全面改革。对民族素质的探索引起了国民性研究的热潮，对思考方式的反省也点燃了文体革新运动——新文学运动的火焰。小泉八云就出现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思想文化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中。特别是在东亚，正值世界形势发生转换的时期，如果要证实小泉八云的评论所发挥的作用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去认识评论家赫恩了。

赫恩一生最后的十几年是以“小泉八云”的名字在日本度过的。而且作家赫恩的名气也源于这一时期。当然，在中国谈小泉八云，以及小泉八云在中国的命运，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近代中日关系的消长盛衰。

赫恩所记载的有关明治时代的日本包括自然、民俗、诗歌、艺术等许多方面，而这些对于往往忽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的中国读者来说，可以说确实是很新鲜的。其鲜活的感情，细致的观察，以及独特的分析不用说都给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

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

带来了不少的刺激。近代中国的知日派中国人都从小泉八云的著作中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以“了解敌人”为目的的研究日本的热潮出现了。于是小泉八云作为全面了解日本人想法的知日派的前辈受到瞩目。接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更将一种意想不到的身份强加于小泉八云身上。在日本占领期间所发行的杂志等书刊上处处可见小泉八云的名字。“亲日家”这样一种印象一直存在，因此“小泉八云”这个名字正好成了一种掩饰和幌子。另一方面，抵抗日本侵略的共产党将赫恩的日本研究中可取的部分，例如应该说是其“集大成”的遗著《日本——一个解释的尝试》的中文译本登载在共产党地下组织所控制的《杂志》上，这也是意义匪浅的事实。对于“战时下的小泉八云”的研究不仅对于占领期文学的解读，而且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也从意想不到的侧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正确把握一直只强调他“诗人”这一面的赫恩所做的日本研究。

赫恩是活跃于世界史时代的作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这位作家的，本书随后要讨论这一问题，同样，本书与其说是从比较文化史的视点去看问题，倒不如说是为重新理解赫恩而做出的新的作家论的尝试。总之挖掘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能够客观地认识到这位作家——一位近年来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被重新看待，敏锐地看到了世纪末的转换而做出文明批判，以及创造了丰富而且错综复杂的作品作家，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也能成为照亮这些成就的光源吧。至少我是这样期待的。

凡 例

一、对小泉八云作品的引用，原则上是出自 Ho-ton Mihurin 社版《著作集》全十六卷（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Co., 1922）仅记录卷数（罗马数字）和页数（阿拉伯数字）。有关未收录在这本《著作集》中的作品的出处，会在当时进行标记。

二、有关日语译本，在借用已经出版的日文版时，仅将译者姓名明示于（ ）内。没有特别标记时则是本人的拙译。借用的日文版书籍如下：

西胁顺三郎、森亮编《Lafcadio Hearn 著作集》全十五卷（恒文社）

平川祐弘编《小泉八云名作选集》全五册（讲谈社学术文集）

平井呈一全译《小泉八云作品集》全十一卷（恒文社）

柏仓俊三译《神国日本——对解析的试论》（平凡社 东洋文库）

三、有关日语文献的书写，将一部分旧体字改成了常用汉字，历史假名的使用还是照旧。

目 录

序	1
凡例	1
第一章 世纪末的文明批判	1
一 东方与西方的融合	1
二 罗德亚·吉卜林与罗提眼中的日本	11
三 人种与混血的意义	20
四 某些保守主义者	30
第二章 谈谈日本文化	43
一 “亲日派”——Japanophile	43
二 遗传思想	51
三 国民性的启示	61
四 战争前夜的日本论	71
第三章 评论家赫恩	84
一 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与小泉八云	84
二 京派作家与小品散文	95
三 托尔斯泰论的周边论	117

第四章 战争年代的小泉八云·····	133
一 《东西》的“世界大同主义”·····	133
二 聚集于《风雨谈》《天地》《杂志》的作家们···	140
三 《神国日本》的定位·····	160
四 耐人寻味之眼——貌似赫恩·····	177
跋·····	191
主要参考文献（仅限与赫恩相关的书）·····	194
索引·····	196

第一章

世纪末的文明批判

一 东方与西方的融合

1903年2月，冈仓天心（1862～1913年）的英文著作“*The Ideals of the East*”（《东方的理想》）由伦敦 JONH MALAY 出版社出版。此书开头第一句“亚洲大同”正是凝聚了作者文化理念的箴言。正因为是高度凝练的警句，之后也作为一句容易着上政治色彩的标语独立出来。比如进入昭和时期之后，这句话还被当局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政治思想作为关键词使用，但是这明显是与冈仓天心的本意相违背的。

“the East”应该指的是认识了“西方”的“东方”。19世纪以后，“西方”以“文明”的力量征服了“东方”，统治着东方，也有了新的“发现”。冈仓天心作为活在这种“东方”的内部的人，当他感觉到这种“发现”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他又产生了一种对传统的觉悟；受东京大学所聘请的外教费诺罗萨的熏陶，冈仓天心领悟了日本的传统美术，如果考虑到这个事实，那么这种觉悟必定是充满痛苦的体验。

我们确实应该感到羞愧，我们对于近邻各国的了解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欧洲，因此即便实际上没有歪曲的意图，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欧洲人的解释去渲染这种理解。外交官的令人惶恐